
日本利用国共对立发动九一八事变

殷昌友

本文拟对日本军国主义利用国共两党破裂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作一考察。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的中国大革命运动迅速地由广东发展到长江流域。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大革命迅猛向北发展，将有“威胁到满蒙的危险性”^①，要巩固它从俄国手里夺来的“满蒙”特权，必须阻止中国革命的北上。然而，靠旧军阀与中国革命对抗是不行了。1927年初，币原外相根据在武汉的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的报告得知：在国民革命内“蒋派和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②币原制订了分化国共合作以阻止革命北上的“妙策”。日本采取了利用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的矛盾，扶植“稳健分子”（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压制“破坏分子”（指共产党），瓦解国共合作的具体离间分化政策。^③日本政府对南京、汉口两事件采取不同的对策就是这种政策实施的典型例证。

1927年2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强烈要求增兵进行武力干涉。日本币原外相认为：“支持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可以避免国民革命的锋芒指向日本。”^④当时日本军方也积极支持这种政策。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主张：对于南京事件，应该“拥护蒋介石等南方派中的稳健分子，在英美各国与蒋介石之间进行调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517页。

② 币原和平财团：《币原喜重郎》，昭和30年，第318—319页。

③ 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18《满洲事变》，昭和48年，第17—18页。

④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517页。

停斡旋,并予稳健分子以所希望之援助”。^① 4月3日汉口事件发生,日本出动6艘军舰,约500名陆战队登陆参加战斗。日本对宁汉两案绝然不同的对策,充分表现出它支持蒋介石,打击共产党和正与共产党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彻底分化中国革命的意图。所以,在宁汉发生对立时,币原外相希望蒋介石来“维持秩序压平暴乱”,并且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蒋介石“独有创举”,中国革命的前途“由蒋介石及其健康分子来安排”。^② 蒋介石在上海武力分共,国共首次合作的国民革命在还没有深入到北方时便遇到挫折。

田中内阁上台后,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但他认为:“只要对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不提出过分要求,那么对日本来说,蒋介石之南京政府的存在较之共产党乃至共产党影响下的武汉政府更令人满意。”^③ 在5月12日田中与蒋的特使蒋方震和刘厚生会晤后,对蒋介石“明显地寄予更大希望”。^④ 为了维护和巩固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权益,田中内阁继续实行破坏国共合作的政策。田中在施政方针中强调,对于共产党在中国的活动不能漠不关心。^⑤ 他的第一个对华行动,就是发出5月9日通告,拒绝武汉政府提出的关于讨论“满蒙问题”的要求^⑥,并积极与南京政府接触,诱逼武汉国民政府分共。

在“东方会议”上,陆军参谋部松井石根反复强调“日本应严加防范两政府合而为红色”。他主张日本支持以蒋介石、何应钦为首的“南京派”,继续“排斥共产主义”,使中国“渐趋稳健”,认为这对巩固和扩大日本以“满蒙”为主的在华权益十分有利。^⑦ 在会上,日本军政要员还提出要分化武汉政府内的国共合作以促成两党彻底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135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27年第2卷,第164页。

③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④ 外务省记录PVM23,第147—148页;163—164页;191—196页。

⑤ 同上,第411—417页;57—59页;86—105页。

⑥ 同上,第141—143页;149—152页;220页;245—249页;298—301页。

⑦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198页。

分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在会上说：“他们（指汪精卫集团）承认共产主义的实施已经失败，因此逐渐趋于稳定，但是要巩固武汉政府，必须排除不逞之徒的共产党员。”^①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田中首相宣示的《对华政策纲要》，反映了日本排斥共产党，要与“稳健分子”联合，彻底“分化中国革命的意图”。^②“东方会议”决定的对华政策策略，就是通过彻底分裂国共合作引起两党内争，来阻挡中国革命向北深入和扩展，巩固和扩大日本以“满蒙”为主的在华权益，为以后的侵华作准备。这种对华策略为历届军国主义政府所施行。“东方会议”结束不久，为了支持武汉的分共，日本派遣“数艘军舰和 450 名陆战队在汉口待命”，理由是随时帮助武汉国民党政权对付可能的共产党的攻击。^③

日本军国主义不遗余力地想利用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促使两党分裂，以阻止中国大革命对它在我国东北特权的冲击。但是国民政府继续北伐，“东北易帜”，使日本的这一如意算盘无法再打下去。

于是，日本又利用国共内战激烈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总根源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华扩张野心，但是选择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主要是出于日本对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的判断。

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波及日本后，日本并没有立即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只是加紧了挑起侵略战争的准备。1930 年 7 月板垣、石原带领人员，在东北的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泰来、洮南等地作了 13 天的侦察旅行后，由石原整理了一份完全占领东北的方略《满蒙占领统治研究》，当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审核这个方略时间：“会管用吗？”石原含笑表示：

① [日]山浦贯一：《森恪》，第 858—856 页。

②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 525 页。

③ 外务省记录 SP304；第 92—93 页。

“管用！还得要两年。”^①当时他们认为时机不成熟，只是积极准备寻找战机。不仅关东军，日本政府也正在寻找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最佳时机。1930年12月7日在日本拓务省大臣办公室召开的有松田拓相、吉田外务次官、松永条约局长、河部陆军次官参加的会议上，通过了《日本灭亡满蒙秘密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指出：“欧战后，华盛顿会议所缔结之四国协约，无不束缚帝国在满蒙之自由行动，如帝国果以急进的帝国主义以临之，必一举而惹起各国之误解。”因此强调“满蒙政策必须在国际方面、在中国方面都有机会时，方可断行。”^②

1930年底，国共两党内战逐步扩大，国民党政府将地方军队对红军的“会剿”改变为以中央军为主大规模的军事围剿。1930年底至1931年上半年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使日本感觉到最佳时机已经到来。1931年板垣、石原在已制定好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案》中指出：目前中国内部（主要是国共）“纷争不已”，军事斗争越来越激烈，因此“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力反应”。^③正是鉴于这种形势的分析，关东军才决定迅速实施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军事斗争开始后，无论是关东军还是日本军部和政府“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呼声就更加高涨了。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贵族院研究会召开的政务部会议上，土肥原就公开呼吁：日本要趁中国国内国共两党正激烈内战之机，为了“既得利益”，下定武力侵占满蒙的决心。^④尽管关东军和军部之间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和步骤不一定一致，但对“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是一致的，因此，关东军在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和步骤上并没有听从军部意见，而只是依据自己的形势判断选择在第三次围剿斗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9月。7月，日本关东军制订了柳条湖攻

①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128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38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191页。

④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198页。

击计划。8月初刚刚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告诫部下注意中国形势的发展,并强调“如有可乘之机,应立即抓住”。^① 8月中旬国民党在大连的军事情报人员发回报告:日本“将乘”中央军全力围剿红军,而“共产党蜂起反击之机,出兵满洲”。^② 9月18日晚,获悉关东军要发动事变的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赶到奉天,板垣、石原等关东军的参谋立即与之会见,并进行了“数刻之久的激烈辩论”。建川少将假作主张缓进,而“板垣、石原两参谋对这个建议轮流加以反驳”,并强调说:“现在不解决满蒙问题,好机会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经过“辩论”后,板垣、石原“断然占领满蒙的方案”得到大多数的支持,建川也“表示谅解”。^③ 当夜22时柳条湖事件就发生了。

从以上经过我们可以看出:日本选择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利用国共内战方般的考虑。而这种考虑是基于以下两种认识而产生的。第一,基于它对中共的详细了解和全面研究。国共合作破裂后,日本一直注意中共势力的发展,而且还在30年代初开始了对中共问题的全面研究,《文献考》就是当时日本全面研究中共问题的资料集。^④ 中共和红军力量的迅速壮大使“日本军部感到极大威胁”。^⑤ 不少军国主义分子认为“共产党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四处蔓延”,与俄国五年计划有直接关系,这必将成为日本实施“满蒙计划的祸根”,所以极力呼吁趁两党激烈内战之机发动侵略战争。^⑥ 第二,基于它对国民党政权反共坚定性,和国共两党严重对抗时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联合或单独抵抗的判断。国民党政权的坚决反共行动,使日本认识到须乘两党内斗时发动侵

① 张田家改编:《伪“满洲国”始末》,第72页。

② 章君毅:《抗战史话》(台北),第11页。

③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1964年版,第161页。

④ 程慎元:《川崎长幸的〈文献考〉简介》,《中共党史通讯》,1991年5月10日,第7页。

⑤ [日]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130页。

⑥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198页;第206页。

华战争。第一,第二两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亲自任“剿总”,率30万军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并提出:不先消灭红军共产党,“则不能御侮”。^①这使日本认识到“这种情势是占领中国东北的最好机会”。^②因此,当国共两党在第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进行到关键的时刻,发生九一八事变不难理解了。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战史》也认为:日本在掌握了国际有利情势后,又趁“政府在湘鄂赣诸省平乱,判断中国此时无力对外,因而日本军阀敢将《九国公约》、《非战公约》视如废纸,断然在民国二十年发动九一八事变”。^③

(作者系中南财经大学政法系研究生)

①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第186页。

②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1959年版,杨辉译,第278页。

③ 《国民革命战史》第3部第1卷,第20页。